

山嵐中的塑像

沈大力



神秘蒙额的绮门相对；像座上镌刻着韩素音表达自己终生志向的警句：“吾欲在书中引入普世的人性”，以兹来往过客瞻念。

近 20 年来，韩素音因“过度亲华”，遭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偏执者蓄意抵制。现在瑞士图书村为她立像，无疑具有特殊意义。原法国斯多葛出版社文学部主任玛丽·彼埃尔·贝女士谈及此事时对我说：“韩素音的小说都是由我们翻译出版的，在法国曾赢得大量读者。但是，随着中国文革真相的披露，她的亲华立场和言行受到指责。迫于舆论，我们不得不停止出版她的作品。不过，她的《瑰宝》确是一部十分感人的爱情小说，讲述了她跟英国年轻记者莫里森的一段恋情，后者 1950 年在朝鲜战争中乘吉普车触雷身亡。我十分欣赏这部作品，准备近期在我任职的法国水星书局重版。”

“中国是我倾心的国度。”10 年前，韩素音同她的印度丈夫在蒙莱湖畔“和平饭店”宴请我时深情地说，“我始终保持一颗中国的灵魂，矢志不渝。”显然，她以此为荣耀，毫不为在西方文坛遭受孤立而懊悔。

19 岁时，韩素音就读比利时自由大学。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她中断学业，离开比利时血统的母亲，毅然回到父亲的祖国，在四川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服务。尔后，她赴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尼泊尔和印度，行医之余勤于笔耕，陆续发表《冬恋》、《对影成一人》等多部小说，获得了国际声誉。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她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呼吁返回中国，在北京与老父亲重逢。从此，她每年都要访华，到各地体察中国民情，向西方客观地介绍中国，驳斥欧美媒体的僵硬立场，因而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列入了黑名单。

数十年间，韩素音足迹踏遍欧美、印度和中国。她注重人际交往，深信百闻不如一见，

外国游客甫抵斯德哥尔摩国际机场，便会看到走廊上悬挂的诺贝尔巨幅照片，上面写有醒目的大字——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其实，在瑞典感受诺贝尔，这只是开始。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1833 年 10 月 21 日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他 9 岁的时候，便举家搬到了俄罗斯圣彼得堡。此后，诺贝尔除晚年回瑞典居住过很短一段时间外，多数时间都游历于欧美各国，直至 1896 年 12 月 10 日病逝于意大利的圣雷莫市。诺贝尔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化学家，还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并且在物理学、生物学乃至文学等领域都有一定造诣，但是让诺贝尔真正名垂青史的却是根据其遗嘱所设立的诺贝尔奖。100 多年来，诺贝尔奖不仅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奖项，更被瑞典当成国家“名片”。

在斯德哥尔摩以西约 200 公里的小城卡尔斯库加市，有一个环境幽雅的林白桦山庄，诺贝尔故居纪念馆便坐落在那里（见图，雷达摄）。1894 年，已在海外漂泊多年的诺贝尔决定落叶归根，在瑞典度过他的最后时光。因为不喜欢大城市的喧嚣，诺贝尔便买下了卡尔斯库加这座小城一家濒临倒闭的军工厂，在改造成住宅的同时，他还建造了一间实验室，希望能有一些新发明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可一生勤奋的诺贝尔在此时已几乎是油尽灯枯，此后不久，就因健康原因不得不搬到气候温润的意大利居住，直至去世。

因为诺贝尔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生的旧居早已面目全非，白桦山庄就成了今天唯一保存完整的诺贝尔故居。1975 年，这里正式建立纪念馆，把室内陈设，包括当年的实验室都按诺贝尔生前的情景恢复原样，并开出专门展厅陈列诺贝尔一生获得的技术发明专利证书、奖章等，包括他的一份遗嘱复制件也保存在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林信太郎先生最近不幸逝世。当我将这个噩耗转告给国内许多过去与林信太郎有过交往的学者、官员、企业界人士的时候，大家无不表示出悲痛和惋惜之情。

林信太郎 1921 年出生于日本大阪，从京都大学毕业后在原通产省工作长达 30 年。在上世纪 50 年代，他主要关注日本的机械工业，到很多机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参与制定机械工业现代化政策以及扶植企业增强出口竞争力的政策，为此倾注了大部分青春时光。1961 年他根据自己深入基层对关西地区机械工业进行实地调查和指导的实践，撰写了《日本机械出口论》并获得博士学位。此书于 1984 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产生了很大反响。

林信太郎在通产省是著名的学者型官员，被誉为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旗手。

1961 年至 1964 年，林信太郎作为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的代表常驻德国，在该机构驻西德的“轻机械中心”担任所长，阻止了欧洲对来自日本的缝纫机进口实施高关税的计划。在德国期间，林信太郎发现了“自由连锁”这一中小商业的组织形式，并将其引进到日本。他提出中小商店自由连锁方案并对此进行了具体指导，由此被称为“日本自由连锁之父”。1977 年从通产省退休之后，林信太郎到著名超市企业佳士客公司担任副社长。

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林信太郎利用他的影响力，为促进日本政府对华提供日元贷

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在过去的侵略战争中，日本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痛苦，可是人家却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对这样宽容大度的国家，在人家实施改革开放、面临资金短缺困难的时候，难道不应该给予积极的合作吗！

林先生年轻时曾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学习，他的许多中国同学后来都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林先生不仅与那些已在中国各部门担任要职的老同学进行交流，而且还通过他们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国务

为日中友谊劬劳不息——悼念林信太郎先生

冯昭奎 胡欣欣

院发展中心主任的马洪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林先生也因此于 1991 年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作为最早提倡“自由连锁”的流通专家，林先生在 1990 年亲手创立日本自由连锁协会并任会长直至 2003 年。正是在他创建自由连锁协会以后不久，我们因为开展“中日流通业比较”集体课题而结识了先生。他对我们的研究课题给予很大帮助，每次我们去日本考察，他都亲自联系许多流通机构带我们参观。为了介绍日本的流通政策和推广日本优秀的流通企业的经验，

小画家的环保之旅

史万臣

不久前，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迎来了一批中国小画家，他们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08 年中国儿童环保绘画大赛的获奖者。孩子们应邀出席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内罗毕总部举行的颁奖仪式，随后又与肯尼亚当地儿童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同绘蓝天白云

肯尼亚有一所“北京小学”，因中国人资助而命名，专门收养肯尼亚的孤儿，为他们提供免费基础教育。在这里，中国儿童和“北京小学”的 20 名儿童以“我的环境”为主题，共同绘制五彩画卷。两国儿童交叉分成两组，每组绘制一幅。他们围站在大画布周围，一名中国儿童用画笔涂出了一片湛蓝的天空，一名肯尼亚儿童接过画笔，画下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儿。语言没有成为孩子们的交流障碍，对于环保的共通理解

同植环保幼苗

在内罗毕市内的一处山坡上，在儿童环保绘画大赛的发起人、著名环保人士罗红的带领下，中国和肯尼亚两国儿童共同种下了代表希望的环保树苗。肯尼亚孩子种树技能比较娴熟，挖坑、植树、培土、浇水，连一旁的罗红都禁不住为他们连连鼓掌，他说：“我在山里长大，种树也是拿手好戏，不过还是差他们很远。”孩子们互相帮助着，中国孩子也很快掌握了植树要领，将一棵棵幼苗挺立在山坡



上。肯尼亚儿童保护树木的意识很强，有的人为了给学校的树木浇水，不惜每天步行很远的山路，很早来到学校，听到这一介绍，中国孩子们钦佩不已。

同追绿色梦想

马赛人是世界上少有的保留原始生活方式的民族，他们对世界万物持有敬畏之心，像关心家人一样关爱着环境。孩子们来到马赛村参观，了解马赛人保护环境的方法，同时和马

赛儿童进行了一场跑步比赛。

这场比赛的领导者是世界马拉松名将保罗·特加特，他希望中非两国儿童能用一种竞赛的精神共同为保护环境而努力。在学校操场上，中国儿童和马赛儿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随着一声令下，孩子们你追我赶地奔向终点（见上图，史万臣摄）。赛后，他们互相交换礼物，传达着友爱之心。一位可爱的马赛女孩还将自己的绘画赠送给中国孩子，以此方式来表示保护环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梦想。

本版责任编辑
廖政军 王小光
电子邮箱
gjfk@pd.people.com.cn

国际副刊

获奖者的照片及他们的简历会摆放在那里。展示台的后面，则是 10 座纪念碑，将自 1901 年开始的诺贝尔奖历史按每 10 年一组介绍给观众。

而诺贝尔奖最受瞩目的地方并不在这座博物馆，而是每年 12 月 10 日即诺贝尔逝世纪念日举行诺贝尔晚宴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

当晚，会有包括瑞典王室成员、当年诺贝尔奖得主及其亲属、政府主要官员和各界名流等超过 1300 人出席这场晚宴。传统的欧洲宴会装束，特制的诺贝尔餐具，连晚宴的鲜花都是来自诺贝尔逝世地意大利的圣雷莫市，再加上精心烹制的佳肴，还有获奖者的即兴演说，这些场景构成一场号称世界上最奢华的晚宴，同时也把诺贝尔在故乡的荣耀推向顶峰。

可这仍然不是诺贝尔在瑞典的全部。小到纪念章，大到许多城市都矗立着的雕像，诺贝尔在瑞典几乎无处不在。以至人们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在瑞典找到了诺贝尔？还是追随着诺贝尔来到了瑞典？

对瑞典这样一个小国来说，能拥有诺贝尔无疑是幸运的。一方面，无论是每年 10 月诺贝尔奖各奖项的公布，还是 12 月 10 日诺贝尔奖的颁发，世界都因诺贝尔把目光聚焦于瑞典；另一方面，因了诺贝尔奖的魅力，吸引着众多顶尖级科学家到瑞典进行学术交流，从而促成了这个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

不过，诺贝尔有瑞典这样的故乡也是幸运的。百年前，诺贝尔只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科学家兼实业家，诺贝尔奖也不过是世界林林总众多奖项里的新面孔而已，但通过瑞典人多年经营，诺贝尔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名字之一。

感受诺贝尔故乡

雷达



这里。

现在，白桦山庄除作为诺贝尔故居纪念馆外，还成为了世界级学术活动的中心，每年都有多场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各国科学家也都乐于汇聚此地，既能探讨各领域新的科学课题，更可表达对诺贝尔“科学造福人类”思想的敬意。

而在这座真正的家乡斯德哥尔摩，与他有关的建筑更是随处可见。诺贝尔博物馆位于市中心老城的的心脏地带，与瑞典王宫仅几步之遥。这里曾经是瑞典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后来又成为瑞典文学院所在地，2001 年诺贝尔奖百年华诞时，瑞典文学院腾出这个地方，建立了专门的诺贝尔博物馆。

与诺贝尔故居纪念馆不同，这里与诺贝尔本人相关的展品很少，重点介绍的是诺贝尔奖。放眼望去，700 余名历届诺贝尔奖得主的照片悬挂于顶棚专门铺设的轨道上，每天开馆后便不停地转动，所有获奖者的照片转一圈约 3 个小时。博物馆场地中央，有根据诺贝尔奖 6 个不同奖项而搭起的 6 座小型展示台，

最近，笔者有机会两次听到美国专家介绍与美国主流社会沟通的技巧。两位专家都颇具权威，一位是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办公室主任，另一位曾任白宫公共关系部主管。他们在介绍中不约而同强调的一点是：要让美国人对你所讲的话题感兴趣，一定要和他们的切实利益关联起来。要讲一些真实的个人故事，而不能尽讲一些抽象的道理，或者一大堆统计数字。

美国专家的观点令人反思。记得曾有媒体报道，在中美经贸磋商会议中，中国官员习惯于引用许多数字，而美国官员则喜欢讲故事。在我们看来，宏观而又比较客观的统计数字应该更加重要，为什么美国人却喜欢听一些主观的个人故事呢？

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在重要的双边会议场合，中方往往准备充分，多媒体幻

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喜欢听个人故事，认为只有个人故事才最真实。翻开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可以看到许多报道都是从某个个人故事开始的。美国人也正因为太崇尚个体经验，所以容易犯以偏概全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

从教育的观点看，如果你对与中国与美国学校课堂的区别有所了解，就不难理解研讨会上中国发言者的认真准备和美国发言者的看似草率了。中国教师往往认真备课，课堂上口若悬河，教师主导，大部分时间唱独角戏，学生被引导着走。美国教师则往往准备较少的课堂陈述，更多的时间让学生发言、相互讨论。中国课堂教育注重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与训练，重视的是逻辑思维和已有定论的东西。美国课堂则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和直觉思

数字与故事

王晓阳

灯片做得主题突出、内容丰富、逻辑严谨、格式漂亮，演讲起来有条不紊。而美方则常常喜欢即兴表演、临场发挥，好像至多是在脑子里先罗列几个主要观点。是美国人不认真对待吗？看起来不像，例如由老布什总统发起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许多作为主题发言人的美国高官也是这样；是美国人工作节奏快，太忙吗？但许多高官都有庞大的智囊和秘书班子给他们做准备，他们却很少准备完备的幻灯片讲稿。

究竟如何看待这种差别？深究起来，至少可以从价值论、认识论以及教育的观点来讨论。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凡是于我有用的就是真理。离美国人很远的事情，便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因此，和美国人讲一件事情，一定要想好这件事情对他有什么好处或坏处，然后再和他讲。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美国人信奉经验主义的一元论，什么主观、客观，美国人不太信这一套，不认为有这种区分，只有个体经验感觉到的事情，才被认为是真实

维，允许不确定性。中国人重视数字、美国人喜欢故事，究竟孰优孰劣呢？我以为，没有非此即彼的优或劣。中国人喜欢的数字，应该更能够显示客观的宏观发展趋势，但容易失之笼统、不够具体，这也是梁启超先生早年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就批评过的。我们提出的有些数字人家可能会认为不准确，因此不甚相信。罗列太多数字则会显得枯燥。另一方面，美国人喜欢的个人故事，固然容易引起听众兴趣，但也可能犯以偏概全的毛病，甚至误导听众。

但无论如何，在中美双边交流活动中，我们还是要照顾对方的思维特点，这样才能够达到所期望的沟通效果。因此我们所讲的内容，还是要尽可能和对方利益攸关起来，并讲一些生动的个人故事。在引起对方兴趣后，再引用一些和对方有关的数字也不迟。

